

引言

新世紀的商業倫理

國立中央大學 哲學研究所 副教授 葉保強

美國社會在九一一恐怖襲擊驚魂未定之際，去年年底又驚爆了安隆醜聞（Enron Scandal），此案牽連之廣，影響之深，令人震驚。涉案者不只是這間發展曾經叫人欽羨的總部在德州候斯頓市的能源貿易大企業，同時亦包括了有名的會計行，財經界；更令人注目的是，國會議員、布希總統、副總統及其他閣員，是否有份參與亦成了關注的焦點。現時美國國會已經成立了 11 個調查安隆事件的專責委員會，正火速地展開了全方位的調查。這宗複雜及震撼力巨大的商業醜聞事實上對投資界、金融界、會計界、政界，甚至美式資本主義的影響究竟有多深遠，可能要等一段時間才能完全弄清楚。

自從在去年底逐步暴光之後，安隆的醜聞一幕幕展露於世人面前，令人目不暇

給之餘，亦為大企業的高層的貪婪及欺詐等無良感到寒心、噁心。安隆醜聞傳遞的訊息很清楚：貪婪侵蝕了人的良知，利之所在，無所不為，終於泥足深陷，玩火自焚。

對一些熟悉美國今日的資本主義制度的人來說，安隆醜聞的出現是早晚的問題，一點都不會感到詫異。安隆弊案，只是冰山一角，因為導致安隆弊案有制度性的因素。就體制問題方面，《經濟學人》在一月的一篇專文就鎖定美式資本主義體制的問題（The Economist, Jan. 19, 2002, 57-59），而美國經濟學名儒保羅顧爾曼（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的特約社論中就有兩篇言辭辛辣的鴻文，狠批美國經濟體制是一種「親友式資本主義」（Crony Capitalism）。

美式資本主義有何問題？首先，美國愈來愈多人買賣股票，可能是導致安隆事件的一個原因。企業的高層職員的薪資及董事會的袍金多寡主要參考公司的股票的市值，如果公司的表現好令股票市值上升，他們就有更好的回報，作為他們工作表現好的報酬。理論上，這樣做法將公司高層職員的利益與股東的利益連成一起，但事實上，這種利益的連結並不理想。用股票來激勵經理的做法促使他用盡法寶來提高股票的短線價值，令他們可以儘快得到利益，但在長線上對公司及股票的持有人可能不利。

安隆的經理就是盡量用了「特殊用途項目」(“special purpose entities” SPES)的工具，將公司的虧損及欠債隱藏到別的地方去，令其不出現在公司的收支結算賬目之上。照理，公司的董事會應該要求公司高層解釋這些做法，可惜，董事會十之八九都視而不見，沒有盡其應有的管治義務。在這種姑息的環境下，許多投資人的財富方面臨泡湯的危機而不知。知道內情的公司高層心知公司財政岌岌可危，於是在事情還未敗露之前，趁機沽出手上的股票；但員工一來不知大難將臨，二來不能賣出公司的股票（安隆高層用行政改組為藉口，禁止員工沽出股票）。

那些對公司作評分的組織，包括了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亦沒有發揮其應有的防做假功能，提出預警，令投資界

有所防範。如果評分組織精明不足，無法預見問題；則那些投資銀行的分析員的表現更差勁，他們直至安隆事情暴光時居然建議股民去買入安隆的股票！這裡的利益衝突亦是明顯不過的，華爾街的投資銀行家多年來給安隆貸款，事實上，他們亦由買賣安隆的股票，賺了不少。

會計學的學者指出，會計的標準變得愈來愈沒有意義了，因為無法反映出公司的一些新的活動，包括合夥經營(joint ventures)、外委等新生活動的財務內涵。這些標準沒有完全報導一些新生的財產，包括在收支平衡單子之外的財務活動(off-balance-sheet financing, 衍生契約(derivative contracts)等。結果是，公司可以很輕易玩弄數字魔術，隱瞞一些見不得光的勾當。

安隆弊案涉起的商業倫理風暴是歷史上罕見的，安隆只不過是商界不誠實做假的冰山一角，近月不少有名的大企業一個一個被揭發一直在做包括浮報、做假等勾當，令人震驚的是，連一直被認為擔當公正的商業警察的會計行業，也一直在違反自身的專業道德，不顧嚴重的利益衝突，成為了做假及浮報等罪行的共犯；不只如此，整個投資界，包括了華爾街有名的投資銀行，股票分析界等都涉嫌參與犯案。投資市場的最起碼的誠信蕩然無存，投資者對市場的信心完全崩潰，現時（2002年6月）美國股票市場如一池死

水，投資者裹足不前，正赤裸裸地暴露了人類最起碼的道德崩塌之後的惡果。

本專輯所選輯的文章，並不全是討論圍繞安隆弊案的商業倫理問題，而是著眼於一些新世紀商業機構要面對的問題。這些問題有一些是老舊的，如貪污賄賂問題（曾傳家：「賄賂與競爭力」）；有一些是 90 年代開始成為主流議題的，包括商業經營與永續發展（葉保強：「企業永續經營的願景與實踐」），生態觀光的商業倫理（楊國鑫：「生態旅遊的商業倫理：以南埔生態村案例來論」，謝弘俊：「台灣農村社區產業轉型的困境與因應之聯想」）；網路的商業倫理（林永崇：「網路隱私權的商業倫理問題」）；性騷擾與企業倫理（李春旺：「性騷擾與國際企業：文化多元性與文化霸權主義」）；及自安隆及世界通訊等大企業的做假弊案今天極

受關注的企業治理問題（許金田、徐木蘭、陳必碩：「企業倫理與公司治理的關聯初探」）等。以上的文章，不少是理論與實踐兼顧，通過一些重要的案例的分析，展示出相關的理論或論證，尤其有些文章更緊扣著本地的實況而立論，以透顯出應用倫理的一個實踐面及與時代的相關性。本期選出這些文章，希望為讀者對新世紀的商業倫理提供一些刺激思考的資源。

令人鼓舞的是，撰寫這個專輯文章的作者，除了一些資深的商業倫理的資深學者如台灣大學的徐木蘭教授之外，不少年輕的學者及研究生亦開始參與商業倫理的探討與研究；這一批新力軍的加入，定能壯大這一個領域的研究人才及實力，對進一步推廣及加深本地的商業倫理教研有很大的幫助。